

文章编号:1673-1751(2013)03-0056-09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研究述要

于婷婷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作为其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议题不仅在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大放异彩,而且后世文化理论工作者对它的研究也从来没有中断过。对该理论的研究,主要在以下问题上形成了一定的知识“存量”:一是关于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发生语境的研究,二是关于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批判维度的研究,三是关于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局限性的研究,四是关于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在中国适用性问题的研究,五是关于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对我国当代文化建设的借鉴意义的研究。

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研究述要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开大众文化批评之先河,在20世纪30-50年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出了文化批判的最强音,成为后世大众文化研究的奠基性理论。对该理论的研究,主要在以下问题上形成了一定的知识“存量”:一是关于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发生语境的研究,二是关于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批判维度的研究,三是关于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局限性的研究,四是关于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在中国适用性问题的研究,五是关于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对我国当代文化建设借鉴意义的研究。本文在对上述问题研究现状进行择要阐述的基础上,力图指出现有研究的成就及不足,目标是在进一步深化对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认识的基础上努力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大众文化理论,并以此为指导推动我国大众文化的健康发展。

1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发生语境研究

对任何理论的研究都不能回避其产生的特定历史语境和它诞生的营养资源,对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发生语境研究内在地囊括了对其社会历史语境与文化语境的研究。要客观分析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理论必须厘清它萌生与

发展的具体历史背景及其理论源流。

由于法兰克福学派生活的时代跨越了德国与美国两个不同的社会环境,因此关于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产生的历史语境,学界基本认同德国的法西斯极权主义政治背景与美国商品形式伪装下的大众文化社会,是法兰克福学派产生的历史背景与现实土壤。美国学者斯特里纳蒂指出,“在纳粹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国家和美国的垄断之中,消费者的资本主义形成了法兰克福学派分析通俗文化和大众媒介出现与发展之语境的各种关键特征”。^[1]我国学者陆扬也指出,“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批判,两个最为典型的语境应是纳粹德国和战后美国的垄断资本主义消费社会。脱离这两个典型语境来妄谈批判,或许难免是无的放矢,隔靴搔痒。”^[2]陈振明认为,以纳粹德国为代表的极权主义国家以及以美国为代表的文化伪装下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在日常生活中的渗透作用对经典文化进行野蛮地操纵,这是法兰克福学派转而对资本主义变化了的文化模式进行批判的历史背景。^[3]赵勇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模式、法西斯主义给“社会研究所”成员带来的痛苦记忆以及20世纪30-60年代美国大众文化蓬勃发展的局面,是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理论形成的历史语境。“‘西马’的认知模式使‘研究所’成员形成了‘大众犹如原子’的判断,因法西斯主义而形成的心理图式使他们得出了‘大众文化是极权主义的温床’的结论,而美国的大众文化一方面唤醒并确

收稿日期:2013-03-25

作者简介:于婷婷(1989-),女,山东济南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立了他们批判大众文化的精英主义立场,一方面也使他们强化了‘艺术与大众文化’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4]正是在这种认知模式以及特定的历史环境的影响下,法兰克福的大众文化理论才体现出如此浓郁的批判色彩。尤战生则撰文指出,一体化的社会和单向度的人是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的历史语境。在文章中他指出,先后生活过的纳粹德国与美国社会的一个共同特征是社会的一体化与极权化,这种专制的社会必然包含文化上的专制,所以走向单质性、一体化就是现代工业社会中大众文化的必然命运。“这种单质性、一体化的文化又加剧了现代人性格的单向度性以及现代工业社会的专制程度。正是在这种历史语境之下,法兰克福学派才对现代工业化的大众文化做出无情的批判。”^[5]

关于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发生的文化语境,学界说法不一。有学者从法兰克福学派整个社会批判理论的角度探讨了其思想渊源。如早在1980年,徐崇温教授就曾提出,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思想源流有三个方面:其一是被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等著作中批判过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的批判”,尽管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与青年黑格尔存在着某些差别,但这仍然成为它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渊源。其二是存在主义,并且法兰克福学派企图用资产阶级存在主义来修正马克思主义。其三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结合,突出表现在马尔库塞1955年发表的《爱欲与文明》一书中。^[6]陈振明教授对此也持相似观点,他认为马克思的学说以及卢卡奇等人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尤其是黑格尔哲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存在主义哲学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几个主要理论来源。^[7]汝绪华、汪怀君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不仅有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而且有丰富的思想理论来源。他们指出,浪漫主义与悲观主义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的文化根源,它们至少在三个方面影响了法兰克福学派。“其一,对科技文明的悲观主义态度,以及对工业文明的批判;其二,对自然和真情的浪漫主义的向往,以及向生活世界的回归;其三,对技术理性的批判精神和立场,弘扬价值理性、人文理性。”^[8]此外,马克思的异化理论、韦伯的现代社会合理化理论、卢卡奇的物化理论

都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都是其理论源泉。

除此之外,还有人直接考察了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发生的文化语境。王小岩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有三大思想渊源,即:他们吸收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并以异化理论为依据深刻地批判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己的文化力量对人的自由的束缚,弘扬了马克思学说的批判精神;其次,法兰克福学派参考了20世纪西方社会的文化批判理论并为其所用。如马尔库塞将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相结合,从爱欲与文明的角度批判了现代人的压抑性心理机制;最后,她还指出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理论在进行文化批判的同时将艺术审美救世主义作为其理论的解决方略,是对现代西方美学思想的改造。^[9]刘岭认为德法的思想传统是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诞生的直接营养资源。法兰克福学派直接继承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理论和人道主义思想并对此作了修正;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提出的物化理论以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10]耿连娜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理论来源至少包含以下五个方面: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与本体论以及黑格尔辩证法的否定性思想。^[11]虽然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诞生得到了形形色色的理论的滋养,我国学界对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发生的文化语境说法也不尽相同,但是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以及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滋养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这一观点得到了普遍认同。

2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批判维度研究

李小娟撰文指出,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从四个方面剖析了20世纪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异化的突出表现——大众文化。即:大众文化的商品化——创造性的丧失;大众文化的齐一化——个性的虚假;大众文化的欺骗性——超越维度的消解以及大众文化的操纵性。^[12]于文秀指出,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表现为对其标准化、齐一化、欺骗性、操纵性、强制性以及集权化等特

征的批判。她认为,不同于英国传统的精英主义文化理论,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没有仅仅局限于文学—文化或文化层面,而是将其拓展到更深邃的哲学层面。^[13]詹艾斌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主要从五个方面展开对大众文化的批判:第一,大众文化的兴起改变了人类活动的性质;第二,大众文化的生产具有标准化、齐一化的特征;第三,大众文化生产的标准化、齐一化泯灭了文化的个性;第四,大众文化具有商品拜物教的性质;第五,大众文化是一种潜在的支配和操纵的社会性力量,具有强制性。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这五个方面批判的根本指向是社会批判,通过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同时实现社会批判的功能。^[14]尤战生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可以集中表述为:通过对大众文化的商品属性、大众文化的标准化和伪个性化的论证展开对大众文化非文化性的批判;通过对大众文化意识形态性、大众文化对民众深层心理的控制和操纵展开对大众文化非大众性的批判。^[15]向德采通过对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梳理指出,法兰克福学派重点批判了大众文化的商业性、消费性、流行性、强迫性和边缘性等特征,其中商业性是大众文化最为显著的性质。^[16]

除以上学者的表述,学界还有一些人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笔者在此不再一一罗列。经过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在我国学者对法兰克福学派针对大众文化批判的理解中,出现频率较高的为商业化、标准化、齐一化、欺骗性、操纵性等词语。由此我们可以认为,针对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批判维度这一问题,学界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虽然不同的人表述的方式和用词可能会有所不同,但是所表达的观点却是所差无几。总体看来,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批判维度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是通过对大众文化商品化特征的剖析展开政治经济学维度的批判;第二是批判了在现代科学技术的依托之下,大众文化产品的生产具有了标准化、齐一化的特征,使文化艺术的超越维度被消解,特殊性丧失殆尽,这是对大众文化美学维度的批判;第三是控诉了大众文化对人的欺骗与控制,对大众文化进行意识形态学维度的批判。

3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局限性研究

法兰克福学派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文

化异化现象的批判可谓淋漓尽致、入木三分。但是,理论的深刻之处往往滋生局限,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也不例外。我国学界对该理论局限性的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达成了共识。

第一,精英主义的批判立场导致其理论具有很强的保守主义色彩。罗小青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站在旧的文化贵族市场,以文化精英自居,强调人与社会、人性与科技、文化艺术与时代的对立,以先验的道德伦理价值观来衡量文化艺术和文化生产,因而使理论严重落后于实际。”^[17]徐向阳指出,“受卢梭思想的影响,法兰克福学派悲壮地树起对现代西方文化进行批判的祭旗,由对现代科技文明的抵触转向对中世纪田园牧歌式的浪漫回想,不禁流露出情绪的惶恐和理论本身的捉襟见肘。”^[18]马驰同样指出,“法兰克福学派站在文化精英主义立场,强调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内在差异,试图通过唤醒艺术的批判否定的乌托邦精神来改造不合理的社会现实。这一主张无疑具有深厚的历史责任感和深远的文化价值”,但是,“他们没有真正做到从历史的现实发展上、从艺术本身的动态变化中准确地揭示和分析文化的自身发展规律,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过多地停留于对经典艺术的怀恋和伤感,表达了一种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济世情怀。”^[19]美国学者舒斯特曼在谈到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精英主义立场时也曾指出:“这不仅使我们与社会的其他人相隔离,而且也是反对我们自己。…这种对通俗艺术不合理的批评是在捍卫审美愉悦的大旗下进行的,他代表了一种禁欲主义。”^[20]

第二,批判对象发生错位,批判视角出现偏差。众所周知,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的对象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文化工业,但由于他们把对德国纳粹操纵大众文化的经验不加修改地搬到美国这个与极权主义有所区别的自由资本主义国度,由此导致了其批判理论对象的错位与视角上的偏差。尤战生指出,由于对纳粹的专制独裁有着切肤之痛,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对于专制与极权有着异于常人的敏感。法兰克福学派成员认为,美国社会经过商品包装的大众文化仍然是一种极权文化、单质文化。因此,美国的大众文化成为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的主要对象。但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是以批判德国纳粹社会的态度来批判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5]所以,

他们的理论不可避免地带有片面性和偏激性。罗小青认为,纳粹集团的残暴统治带给研究所成员的仇恨和恐惧影响了他们的文化研究,使理论视角出现了偏差,从而使学派成员近乎偏激地执著于对资本主义大众文化的强烈批判,形成了对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的偏见。^[17]阿兰·斯威伍德认为纳粹德国带给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创伤与记忆的深刻性使得他们认为“美国的‘文化工业’所作无他,正是与法西斯国家相同”。^[21]美国学者马丁·杰伊也曾对法兰克福学派批评对象的错位进行过阐述,“他们仅仅根据法西斯的潜能而判断美国社会。他们孤立美国社会到如此程度,以至于无视美国的发达资本主义和大众社会不同于他们在欧洲遭遇的历史因素……欧洲和美国的相似被其成员煞费苦心地搞清楚了,对其不同却未涉及。”^[22]

第三,批判有余,建构不足,使文化批判理论呈现出浓厚的悲观主义色彩。法兰克福学派以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去看文化的发展,其理论专注于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力图从文化角度阐释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繁荣表象下的异化现象,但是它并未做到在“破中求立”,可以说是“批判有余,建构不足”。张颐武指出,法兰克福学派“常常强烈地表达一种对于媒体及大众文化产品的激烈的否定性意见。这就给那种经验论的有关媒体及‘大众文化’乃是一种低俗的文化产品的论点找到某种合法性。但这种‘批判’难以进行具体的、深入的读解和分析。因为他对于媒体的贬抑本身,只能是对旧的话语框架的捍卫,而不是对一种新的机构、新的要求和新的理论的回应与对应。因之它依然只能加剧‘阐释’本身的焦虑与危机。”^[23]汝绪华、汪怀君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过多地放在文化领域,实际上“弱化了对实质的经济利益根源的分析。因而,面对现代社会异化的状况,理论家们一方面表现出了悲观主义、失落感,另一方面,提出的解决方案限于抽象层面,大多有改良主义的倾向,这也削弱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精神。”^[8]陈乐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设性维度不但未予彰显,反而多有遮蔽,批判有余,建构不足。而且,其批判也具有很大的抽象性,仅仅局限于做出各种价值判断,仍然缺乏像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那样必要的实证性分析。^[24]范希春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缺乏有关未来社会的积极

设想,因而其批判是消极的,主张是倒退的”,他指出“连马尔库塞自己也承认:社会批判理论没有任何能够填补存在于当代和未来之间鸿沟的概念。因为批判理论不承诺人们任何东西,不给人们展望任何东西”。^[25]

第四,忽视了大众的主体性特征,片面夸大了大众文化与科技的负面影响。法兰克福学派在其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中指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文化已然堕落为意识形态统治的工具,成为整合文化的“社会水泥”,科学技术也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或“意识形态的新形式”,具有明显的工具性和奴役性。在这种悄无声息地隐秘的控制下,大众迷醉于文化工业提供的文化商品而丧失了原有的阶级意识与批判精神,安于现存的社会制度成为了一群“无能为力”的“幸福的”享乐者。针对这一观点,学界许多人提出来了质疑,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忽视了大众的主体性,片面夸大了文化与科技的负面影响。罗小青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在对文化工业的批判中,“忽视了受众在消费产品时,每个个体的审美感方面的共性;同时也忽视了每个个体在接受这些产品时,由于各方面的不同而产生的独特审美感受和审美差异;忽视了各个个体在接受同一类产品时会有不同的审美想象、审美领悟、审美创造等方面的艺术创造性”。^[17]姜华指出,“大众文化为大众提供了一个认同立场,每个人都有权利根据自己的爱好和品味去欣赏自己喜欢的东西,不必顾及意识形态的道德的要求。使大众拥有比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多得多的选择机会,实际上有了更多的主动权”,而法兰克福学派在对大众文化进行批判时“忽视了大众本身对大众文化具有较强的判断能力和选择能力,并不是完全被动的接受者和受众的机器”。^[26]马驰进一步指出,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将理论的锋芒过于集中地指向文化商品化的现象形态,他们站在精英主义的立场,基本上将大众等同于被动的客体和接受者,没有看到或低估了大众本身的批判性和主体性。但是“大众接受和欣赏大众文化,其原因并不完全取决于大众文化的经济本质和政治本质,其结果也并不一定导致大众对大众文化、对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的完全认同,从而接受其意识形态的控制”。^[19]尤战生认为法兰克福学派视野中的大众文化不满足大众的真实需要只满足他们的虚假需求,而这也是大众文化实施其心理控制的手段之

一。大众文化通过压抑大众的真实需求就削弱了大众的爱欲力量,并进而削弱了他们反抗社会和追求解放的力量。该学派夸大了大众文化的控制能力,对大众的主体性和反抗性明显认识不足。^[5]

针对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与科学技术本身片面性的刻意夸大,陈振明认为,“法兰克福学派没有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文化采取辩证的态度,有全盘否定这种文化的明显倾向,没有看到这种文化所取得的成就的一面”,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也产生了大量优秀的文化艺术作品,出现了一批杰出的文学艺术家,在艺术形式和创作手法上也是有所创新的,这是为全人类的文化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法兰克福学派在对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的批判中,显然很少注意到这一点”。^[3]范希春指出,法兰克福学派完全站在科技文明和大众文化的对立面,理解评价文化工业和大众文化。他们以绝望和恐惧的心理、悲观主义的情怀看待人类文明和科技进步,其文化批判理论“无视科技文明的发展给人类带来的进步,工业文明对文化的推动作用,文化工业给艺术生产注入的活力和给艺术生产开拓出的新的领域,而一味地从抽象的人道主义出发强调人性与科学发展的反比关系。”^[25]英国文化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费斯克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理论的重大缺陷就是仅仅看到了中心化的、规训性的、霸权式的、一体化的、商品化的力量,以及被纳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被动的、被操纵的和麻木的受众。而实际上大众一直在规避和抵抗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规训努力,裂解文化商品的同质性和一致性。阿兰·斯威伍德也在《大众文化的神话》一书的“引论”中曾指出这样的观点:“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科学技艺以及资本主义之下的文化,绝非如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所说的,已然或即将沉沦至‘野蛮之境、无意义之域’,并且也绝不是滑落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与此相反,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经济成就与丰富的文化内涵及繁复性,已经臻至史无前例的顶峰。”^[21]凯尔纳旗帜鲜明地指出法兰克福学派的立场,即所有的大众文化(群众文化)都是有意识形态的和同质化的、都具有愚弄和操纵被动消费大众(群众)的效果,同样也是应该被拒绝的。“我对第一代批判学派的理论家们(阿多诺、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等)的回应是,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及其文化和社会因冲突和矛盾

而分裂,而不像早期批判学派的理论家们所表述的‘单向度的社会’或‘完全操纵的社会’”。^[27]美国理论家马克·波斯特指出了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对科学技术不假思索的批判是不恰当的,他将这一理论缺陷概括为“技术决定论”。他指出:“技术与文化的关系问题是阿多诺和霍克海默论述收音机和电视机时最使社会批判理论不利的严重问题”。^[28]

此外,对于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局限性这一问题的研究,我国学者除在以上四个方面达成共识之外,还有不少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如尤战生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缺陷在于它过于极端,“因为大众文化的商品性和标准化而彻底否定了大众文化的文化性;因为大众文化的操纵性而彻底否定了大众文化能为大众服务的一面,并对大众摆脱控制的可能过于悲观”^[5]马驰认为该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虽然沿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但却转移了其批判对象。“马克思要批判的主要对象是代表着资本家利益的社会结构和资产阶级这个阶层,而批判理论和马克思在这一点上却有着相当大的不同,他们的批判重点已经从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批判转向了对现代社会无处不在的技术理性、日常生活现象等的批判,从批判资本家转向批判社会产品。”^[19]

4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适用性问题研究

我国学界对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大众文化发展的这一问题的研究贯穿于对该理论研究的始终。可以说,适用性问题的研究是国内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研究的核心议题。针对这一问题,有学者认为,该理论不适用于我国大众文化发展的经验事实,代表性的观点有陶东风的“错位说”和朱学勤的“瘙痒说”。陶东风指出,“由于中国的大众文化批判没能充分考虑中西方社会文化的差异,因而也就极大地忽视了在当代西方历史语境中产生的文化批判理论(包括法兰克福批判理论)在学理范型、问题意识、价值取向等方面与中国社会文化现实的错位与脱节。”^[29]雷颐指出,中国学者不顾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背景而机械照搬照抄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致使一时间非常“法兰克福”。他认为,大众文化在中国这样一个

由计划走向市场的转型社会里与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具有不同的意义,“这种产生于‘发达资本主义’的理论与一个刚刚开始‘转型’的社会很难完全契合”。^[30]金民卿对这一问题也持相似的观点,他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是我国当前大众文化研究的重要理论依据,但是这种理论“只具有一定的地域合理性,并不具有普适性”。中国当前的大众文化与法兰克福所批判的西方资本主义大众文化状况“不可同日而语”。^[31]吴炫在《中国的大众文化及其批评》一文中也同意“错位”说。他并且指出,在现实生活被纳入市场经济轨道后,不管大众文化还是精英文化,都将不同程度地出现“平面化、商业化、复制化”等特点,所以如果简单地套用法兰克福学派的这样一些概念来批判大众文化,不但会导致解释上的无力,而且“触及不到中国大众文化的实质性问题”。^[32]陶东风的错位说在学界引起来了巨大反响,一时间这成为中国学界重新看待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与中国大众文化的认知框架。除了错位说,朱学勤的“搔痒说”也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观点。他在《在文化的脂肪上搔痒》一文中反对对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的简单套用,认为相对于革命前辈的政治批判与经济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是在资本结构的文化脂肪上搔痒,这样的文化批判,清风逐流云,舒服但作用不大。

针对上述观点,有些学者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在今天仍然是适用的。陈学明指出,尽管我们不同意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全盘否定的观点,但是针对当前我们对本土大众文化负面效应认识不足这一现象,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振聋发聩的批判对我们则具有显而易见的作用。^[33]持相似观点的学者还有童庆炳,他认为,“像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在我们今天还是实用的,因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情况和当年阿多诺等人面临的情况非常相似”,因此,“必须有这么一种批判的声音,有这么一支制衡的力量,大众文化才不会滑的太远。”^[34]赵勇指出,当代中国批判精神的丧失使当前的文化批评呈现一种病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重新审视和正视法兰克福学派的遗产,或许法兰克福学派浓郁的批判精神能把同样处于昏睡中的中国当代文化批评摇醒。”^[35]罗小青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大众文化是一种以追求经济效益为目的的商业文

化,因此,这样的大众文化难免具有消极影响,而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理论的批判精神无疑是震慑大众文化的有力武器。此外,法兰克福学派将一种新的文化现象——大众文化纳入研究领域本身所体现出来的开放的学术视野和宽广的理论胸怀正是我们在进行文化研究过程中所应当学习和借鉴的地方。^[17]

综合以上学者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学界对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在中国的合法性与适用性问题的研究是与时代的发展息息相关的。20世纪90年代初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之所以能在我国掀起一股研究的热潮,究其原因,很大一部分是由于这一时期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稳步推进,以商品经济为根本特征的文化产业迅速发展开来。精英文化的沦陷引起了知识分子的失落与不满,学界竖起了大众文化批判的标靶,而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无疑是最有力的批判武器。20世纪90年代后期错位说的风靡及至2000年之后我国学者能够比较冷静地看待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与中国大众文化发展现实之间的关系,这与大众文化的愈演愈烈这一现实状况有直接的关系。诚然,理论的研究是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进行的,但是我国学界对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最初的分析与探讨带有一定的功利性,这一点是无法否认的。我们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更多的是抱着一种“用”的目的去研究它,在这种研究态度的指导下必然会对其理论生搬硬套,其结果就会导致理论的变质,即“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5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与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研究

虽然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产生与运用有特定的语境要求,但是该理论对于我国当前大众文化建设具有的启示与借鉴意义却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尤战生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对我国的大众文化建设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但这种参考是有限的。我国当前的大众文化兼具一定的文化性和大众性,因此,“从文化的现代性建构方面来说,我国目前最主要的任务是立足当代社会的现实经验和现实需要,构建既符合当代需求又具有未来可持续发展潜力,既具有现代性又具有民族特色的新文化。”

[36] 然而,“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态度以批判和否定为主,它不可能涉及如何建设和发展大众文化的问题,更不可能提出建设的思路与方案,所以,该学派对我国如何建设大众文化虽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但这种参考是有限的。”[5] 陈学明针对有学者提出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对当代中国的影响主要是负面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有人之所以会持这种观点,其依据主要是中国目前尚处于“前现代化”时期,法兰克福学派所批判的现代化的种种负面效应是实现现代化进程中所不可避免的。陈学明尖锐地批判了这种“代价不可避免论”,认为这是一种机械的历史决定论。他指出,中国实行现代化付出一定的代价是在所难免的,但是代价是可以降低一点的,而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恰恰就能起到这一作用,比如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尽管我们不同意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全盘否定的观点,但是针对当前我们对本土大众文化负面效应认识不足这一现象,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振聋发聩的批判对我们则具有显而易见的作用。[33] 姜华认为,法兰克福学派从文化批判的视角揭露了资本主义大众文化对人的意识形态统治的功能,彰显了深厚的历史责任感和深远的文化价值,“亦在理论上启示我们,马克思主义要解决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问题,必须融入文化的视野”。其次,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全盘否定的态度虽说有些偏激,“但他们对大众文化的批判相较于那些在大众文化研究中倾向于文化民粹主义或无批判的立场,甚至放弃批评的观点,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此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文化生产技术上的强大优势对中国等不发达国家实施文化输出,这种文化霸权主义使如何抵制西方文化侵蚀,改变中国的文化弱势地位,提高中国在全球文化话语权的角逐中的竞争力,成为当下中国必须应对的挑战,而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则为此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与理论方法。[39] 陈将鹏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对当代中国媒介运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他指出,大众传播媒介是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重要领域,它不仅是文化生产和传播的工具,更重要的是被看做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传播媒介的批判启示我们,“要在一定程度上批判和限制大众传媒商业化、权力化的趋势。文化传播媒介带有太重的势

力气息必然会破坏它为大众文化的发展繁荣服务的目标”,我们要努力“通过社会先进文化理念的引导来实现大众文化和现代传媒对社会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所具有的建构意义”。[38] 李念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启示主要表现为:第一,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产生有其特定的历史语境,因此我们需要从现实经验出发而非仅从哲学理论出发,在实际语境中发展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第二,时至今日,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中心”位置的高雅文化与处于“边缘”地位的大众文化之间的界限已经越来越模糊,因此,我们要有开阔的胸襟来面对“中心”与“边缘”位置的互换。大众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承载着启蒙大众和提升大众的功能,而高雅文化的实现基础一样是要得到大众接受,从大众身上得到回报才能有其存在的意义。第三是重视市场和传媒。[39]

随着我国学者对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研究的深入,对于该理论与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建设实践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在以上学者的表述中窥见一二。中国文化研究应当看到法兰克福学派预设前提的局限,应当走出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模式,它要思考的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中出现的文化问题和“中国语境”,即“大众文化的中国问题”。这要求我们深刻认识到中国文化研究的自主性使命,要求我们处理好中国文化现实与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关系。不是以他们的理论框架去过滤我们的现实问题,而是把他们的理论作为我们的文化研究的资源和参照加以合理运用,根据“大众文化的中国问题”建构出我们自己的文化理论以指导我国当代的大众文化建设。我们进行文化研究的目标指向是在进一步深化对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认识的基础上努力建构中国特色的大众文化理论并以此为指导来推动我国大众文化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 [1] 多米尼克·斯特里纳蒂. 通俗文化理论导论[M]. 商务印书馆, 2001.
- [2] 陆扬. 文化工业批判的再批判[J]. 社会科学, 2011(2): 180-186.
- [3] 陈振明. 当代资本主义变化了的文化模式[J]. 哲学研究, 1995(1): 13-18.
- [4] 赵勇. 论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理论的生

- 成语境[J]. 学术研究, 2004(11): 117 - 121.
- [5] 尤战生. 流行的代价—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研究[M].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6.
- [6] 徐崇温. 法兰克福学派述评[M]. 三联书店, 1980.
- [7] 陈振明. 法兰克福学派与科学技术哲学[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
- [8] 汝绪华、汪怀君. 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及其意义[J].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2): 6 - 10.
- [9] 王小岩. 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理论的理论定位和思想渊源[J].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 2009(01): 68 - 70.
- [10] 刘岭.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及其运用的语境化解读[D].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04.
- [11] 耿连娜.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研究[D]. 兰州: 兰州大学, 2012.
- [12] 李小娟. 论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J]. 哈尔滨: 北方论丛, 2001(4): 22 - 26.
- [13] 于文秀. 经典大众文化批判理论[J]. 学术界, 2003(4): 241 - 251.
- [14] 詹艾斌. 论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J]. 南宁: 学术论坛, 2004(5): 170 - 173.
- [15] 尤战生. 非文化与反大众: 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版), 2007(6): 45 - 50.
- [16] 向德采. 法兰克福学派关于大众文化特征的理论探析[J]. 温州大学学报, 2003(2): 51 - 55.
- [17] 罗小青. 当代中国场域中的大众文化批判——评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J]. 湖北社会科学, 2006(11): 112 - 115.
- [18] 徐向阳.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评析[J]. 长江论坛, 2006(3): 78 - 80 + 86.
- [19] 马驰. 论大众文化批判的当代意义及其历史局限[J]. 学习与探索, 2004(3): 95 - 100.
- [20] R. 舒斯特曼. 通俗艺术对美学的挑战[J]. 国外社会科学, 1992(9): 38 - 42.
- [21] 阿兰·斯威伍德. 大众文化的神话[M].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 [22] 马丁·杰伊. 法兰克福学派史[M].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6.
- [23] 张颐武. 文化研究与大众传播[J]. 现代传播, 1996(2): 1 - 9.
- [24] 陈乐. 深化和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精神[J]. 长白学刊, 2006(1): 61 - 63.
- [25] 范希春. 论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理论[J]. 山东师大学报, 2000(6): 79 - 83.
- [26] 姜华. 对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再认识[J].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1(3): 1 - 4.
- [27] 道格拉斯·凯尔纳. 关于电视批判理论[M]. 华夏出版社, 2006.
- [28] 马克·波斯特. 第二媒介时代[M].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 [29] 陶东风. 文化研究: 西方与中国[M].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 [30] 雷颐. 今天非常“法兰克福”[J]. 读书, 1997(12): 60 - 64.
- [31] 金民卿. 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研究评介[J]. 哲学动态, 1999(10): 37 - 41.
- [32] 吴炫. 中国的大众文化及其批评[J]. 上海文学, 1998(1): 65 - 74.
- [33] 陈学明. 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在当代中国的意义[J]. 江海学刊, 2000(5): 80 - 86.
- [34] 童庆炳. 人文精神: 为大众文化引航[J]. 文艺理论研究, 2001(3): 52 - 53.
- [35] 赵勇. 批判精神的沉沦[J]. 文艺研究, 2005(12): 5 - 12 + 166.
- [36] 尤战生. 接受与误读: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理论在中国[J]. 山东社会科学, 2011(10): 10 - 15.
- [37] 姜华. 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大众文化理论的比较研究[J]. 社会科学战线, 2010(8): 157 - 161.
- [38] 陈将鹏. 当代视域中的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研究[D]. 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 2012.
- [39] 李念. 法兰克福学派对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批判发展的启示[J].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 2012(9): 144 - 146 + 164.

COMMENTARY OF FRANKFURT SCHOOL'S MASS CULTURE CRITICAL THEORY

YU Ting-ting

(*School of Marxism,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99, China*)

Abstract: Mass culture critical theory of Frankfurt school, as the core issue of social critical theory, not only shone brightly in the western Marxist camp in the 20th century, but its study has never been ceased by the later culture theory workers. The study mainly focuses on the following issues. The first is about the context of mass culture critical theory of Frankfurt school. The second is about the critical dimensions of it. The third is about the limitation of its research and the fourth is about its applicability in China. The last one is about its research significa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culture.

Key words: the Frankfurt school; mass culture critical theory; research commentary

(上接第 55 页)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SECUTORIAL POWER AND LEGAL SUPERVISION

LIU Mao-lin, CHEN Ming-hui

(*Research Institute of Constitutionalism Theory,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073, China*)

Abstract: The nature of prosecutorial power is legal supervision, which is but two general understanding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curatorial authority and legal supervision. The two arguments was originally intended to solve the controversy caused by the deviation of practice from procuratorial organ's constitutional localization. But they are lack of adequate support in logic and in history and thus hard to serve as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procuratorial system reform at present. In the current legal system, legal supervision should be upper concepts of prosecutorial power, which is a special legal supervision. The gap between prosecutorial power and the denotation of legal supervision can be used as a growing space for the prosecutorial power.

Key Words: procuratorial power; legal supervision; legal supervision theory; legal supervision monism